

## 历史学研究新发现

[编者按]史料是史学的基础,缺乏史料,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这似乎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常识。但随着各种“新”史学观的引进和兴盛,学术界某些轻视史料、臆断历史的浮躁之气又慢慢风行起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学风问题外,青年学人对历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史料学方法论素养的欠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资源异常深厚的文明古国,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积累,逐步形成了一种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优良的治史传统,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史料学方法论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为了借鉴历史的经验,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促使史学界对史料学的重视及方法论上的提高,本刊约请了部分史学工作者就史料学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刊发部分同人的心得,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 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学方法论问题(专题讨论)

[摘要]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重博闻善择;重分析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以及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等五个方面。张连生对“史料”定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所谓“史料”应当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它有特定的材料范围,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资料都可以充当的。游彪专就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和解读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金石文字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使用者在运用金石文字时必须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意蕴。陈述则对网络史料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网络史料具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而且它还具有快速、便捷、省时等特点。

[关键词]史料学;方法论;金石文字;网络史料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87-11 [收稿日期]2006-11-28

## 正确认识和处置史料的五种方法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史学家研究历史,撰写史著,必须以史料为根据。但如何辨别和使用史料,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史料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古往今来,史学家们或因亲身感受、或因社会风气、或因学科发展、或因认识提高等诸多原因,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处置史料的诸多见解与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时过境迁,当今已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检索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前人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重在博闻善择。唐人刘知幾在总结、评论前人的历史撰述时,突出地讲到史家对待史料之态

度与方法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他强调说,有成就的史家“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如《左传》、《史记》、《汉书》等,“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辟,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sup>[1]</sup>(《采撰》)。与此同时,刘知幾阐明了史家运用史料的几个原则:一是不应以“诙谐小说”、“神鬼怪物”入史;二是要考察文献的“真伪”,辨析史料的“得失”,如“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者;三是“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应慎于采用;四是因年代久远,“古今路阻,视听壤隔”,或前后混淆,或有无颠倒,都应辨析明白。最后,刘知幾作结论说:“故作者恶道理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

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sup>[1]</sup>（《采摭》）。由此可见，刘知幾所说的“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是建立在“善思”的基础上。从上述引文来看，任何盲目的“征求”、“采摭”史料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关于史家对史料的态度与做法是作辩证看待的。他认为，“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同时，他又说：“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sup>[1]</sup>（《杂述》）。用今天的话来说，即作史应拥有广博的文献资料，而关键在于史家善于辨别和选择那些可靠的、重要的部分。

刘知幾是史学批评家，他讲的这些道理，是对前人撰史的总结，又可为后来者所借鉴，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曾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sup>[2]</sup>（《五帝本纪》）。

从司马迁对待有关黄帝的史料的分辨来看，他不仅舍去那些“其文不雅驯”的史料，“择其言尤雅者”入史，而且还指出何以舍去、何以采用的原因。由此可见，司马迁既是一个“博闻”者，又是一个能够“择善”的人，从而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榜样。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史料的积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庞杂，史家也面临着“博闻”与“择善”的新考验。刘知幾指出，“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存在着“矜其州里，夸其氏族”的弊病，故应谨慎对待。唐代另一位史家李翱又提出对于以“行状”入史的不同意见。他在《百官行状奏》中指出：“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以致“善恶混然不可明”，以此入史，则“荒秽简册，不可取信”。他认为，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sup>[3]</sup>（卷634）。这是指出了行状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撰写行状的实事求是的要求。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实物资料，都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史学家的“博闻”范围空前扩大了，“择善”的考验更加严峻了，刘知幾所说博闻择善的原则应该还是实用的。

第二，要在分类辨析。面对丰富的史料，史学家提出了分类辨析的原则和方法。明代史家王世贞就国史、野史、家史三类历史文献加以比较，对它们的长短得失从宏观上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认识，其《史乘考误·引言》写道：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忌讳，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sup>[4]</sup>（卷20）。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之处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所在，言简意赅，可谓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所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现象。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sup>[4]</sup>（卷20）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撰写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并不过分。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论点是相通的。

所谓“野史人臆而善失真”一语中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以“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的。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sup>[5]</sup>（P630）。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sup>[6]</sup>（卷63）。两宋以后，“野史”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以及沈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碧玉”与事实不合，认为“野史不可信”，是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

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的。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说:“史失求诸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郅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sup>[4](卷20)</sup>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他把“挟郅”、“轻听”、“好怪”概括为一个“臆”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故“不可废也”。

要之,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刘知幾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的辩证认识。

所谓“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王世贞认为,“家乘铭状”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方面的作用,这也是“不可废”的。

什么是“家史”?刘知幾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貽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sup>[1](《杂述》)</sup>刘知幾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唯三族,言止一门”;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sup>[1](《杂述》)</sup>。家史本有如此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如刘知幾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sup>[7](《刘子玄传》)</sup>。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王世贞对“家史”的辨析是极中肯的。

第三,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北宋欧阳修和两宋之际的赵明诚都认识到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前者著有《集古录》,后者撰有《金石录》,是为中国古代较早的金石之学的系统著作。欧阳修在《集古录序》中这样阐述了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他写道:

上自周穆王已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sup>[8](卷42)</sup>

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他深知凡刻石、彝铭,“可与史传正其阙谬”的重要,这一方面得力于他在

研究与撰写历史过程中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笃好于此,并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金石文字的缘故。

两宋之际的赵明诚虽不是一位史学家,但《金石录》表明他是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赵明诚的《金石录》卷帙浩繁,但在社会动荡时期,赵明诚未能亲自将其付梓而离开人世。此书经其妻李清照删削整理,勒成三十卷,印行于世,流传至今。李清照在此书的长篇后序起首写道:“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sup>[9](P560)</sup>。从这段话来看,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治学旨趣知之甚深。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石录》一书,是赵明诚、李清照二人留给后世的一部重要的史料书。

清代乾嘉时期,阮元在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成就亦多,自称做了十件事,如编订《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撰写《积古斋钟鼎款识》等。他认为,金石文字“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sup>[10](卷3)</sup>。阮元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金石文字的。龚自珍评论说:“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助史。”<sup>[11](卷2)</sup>这是进一步明确了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的金石之学同中国近代的考古学有很大区别,而考古学成果的史料价值又远远超过了金石研究。对于近代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史料价值及其方法论的意义,王国维将之概括为“二重证据”,后经陈寅恪进一步阐述,其要义如下: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sup>[12](P219)</sup>

其中,第一条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最能反映近代考古学成就所提供的实物史料,以其与传世文献史料相印证,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而王国维则是这方面的先

驱之一。至于第二条,所谓“异族之故书”系指中国少数民族之“故书”,以其与汉文文献相“补证”,既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又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第三条是说到了史料与“外来观念”的“互相参证”,在方法上对史学亦颇有参考之处。在这方面,唯物史观作为“外来之观念”,其作用和意义就更为突出了。

第四,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从孔子、司马迁到王国维,中国史学家对史料提出了种种认识,其中有一个原则是贯穿古今的,即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这是因为,只有史料具有真实性,才可能写出可信的历史。在该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已往史学家是相通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料问题上更是明确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翦伯赞在讲到历史材料问题时提出了以下一些原则:

最好用第一手材料。

所用的材料必须和原书核对,如因版本不同而有重要异同,亦须注明。

要批判地接受前人对材料考证的成果。

材料要有择别,不要为了凑多,把鸡毛和鸡一锅煮。也不要剔除不重要的材料时,把小孩连同脏水一齐倾倒出去。

不要依据孤证作出结论,武断历史。也不要堆上一大堆材料掩盖历史发展的脉络<sup>[13](P73-74)</sup>。

这里所说的尊重前人在材料研究方面的成果、要善于择别取舍、要避免依据孤证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尤其是不要看重孤证这一条,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重要原则。范文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强调指出:

常用资料固然不少,到底还不算太多,如果要用这些资料来写文章,总得大体上先读一读,知道哪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哪些事情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搜集资料,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工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谁都知道,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列宁告诉我们说:“没有再比那种抽取个别事实,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更为流行更为不中用的了。”<sup>[13](P392)</sup>

这个原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即全面地看问题,从本质上看问题,从杂乱无章、混沌不清的历史现象中捕捉反映历史主流、历史本质的史料,进而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

第五,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在当今音像资料出现以前,我们可以说:史料无言,但在史学家笔下,它可以向人们诉说历史;史料是陈迹,但在史学家把它们合理地编纂在一起时,它们会有生命地活动起来。史家与史料的这种关系,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活力。然而,历史资料的有生命力的表现,还有另一层含义,从而构成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白寿彝最早提出了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观点,他说:

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得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研究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解释现在是为了观察未来。……我看这个意思很要紧。这个意思如果对了,那我们就不会把历史资料看作是死的东西,而是活的东西,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大部分历史资料是有生命力的,现在还有生命力。如果这样理解,历史资料的意义就同过去理解的大不一样了。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在事实上,这两种性质往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两种性质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sup>[14](P308-309)</sup>。

可以认为,关于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见解,是对于史料的极重要的新认识,即人们研究历史、说明历史都离不开史料,人们还会从史料中得到启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问题。这些见解极有启发意义:一是有系统的历史文献与观察规律性的问题;二是历史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有些历史文献至今还有生命力。概而言之,规律性和生命力,是两个重要问题。

## [参考文献]

- [1]刘知幾.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7]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9]赵明诚.金石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 [10]阮元.擎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1]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M].北京:中国书店,1991.

[1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

[瞿林东(1937—),男,安徽省肥东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1980

[14]白寿彝史学论集(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重新审视“史料”的定义问题

张连生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 一、“史料”概念问题急需引起注意

许多知名学者在有关史料学的专著中,对“史料”这个基本概念是忽略不谈的,他们往往都是直接阐述“什么是史料学”、“为什么必须学习史料学”等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什么是史料”似乎是一个常识问题。然而,在目前的一些史学论著中,不时会出现把一般读物中的材料作为史料来引用的现象。例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的内容作史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内容作史料,研究世界史的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美国史》《澳大利亚简史》的内容作史料;有的“史料学概论”著作写成了“历史文献学概论”,有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专著把《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历史读物当作史料加以介绍;一些史学专业的大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弄不清什么是史料,在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过程中,说不清史料和史学论著之间的区别。可见,“史料”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基本概念问题。

### 二、当前各种“史料”定义的缺陷

目前,关于“史料”的定义有数十种,有的是国内学者所作的解释,有的是从国外一些著作中翻译过来的。其中,有的定义过于抽象,令人难以捉摸其具体内容。例如,德国学者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解释“史料”的含义说:“史料为人类动作之结果,确可用以认识并证实历史上之事实,或可由其存在、发生及其他之关系中,以推知者也。”<sup>[1](P145)</sup>而有的定义又过于具体,直接涉及到了“史料”概念下属的种概念。例如,方龄贵《怎样学习元史》中说:“史料是比较原始的历史资料”<sup>[2](P95)</sup>,李良玉《史料学片论》中说:“史料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sup>[3]</sup>显然,这些关于“史料”的定义都不够准确。我们撇开

一些释义不明确、不符合逻辑学基本要求的定义,大致可以把现有的“史料”的定义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定义把“史料”简单地解释为“历史资料”。例如,史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sup>[4](P114)</sup>,“史料就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材料”<sup>[5](P91)</sup>,“史料是反映和记录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材料”<sup>[6](P221)</sup>。这一类说法过于笼统、宽泛,在逻辑学上犯了“定义过宽”的毛病,这样的“史料”定义不仅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事实材料如历史文献、实物、口碑材料等,也可以把各种理论材料如史学理论观点、研究动态、研究成果等材料都包括在内,甚至也可以把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列入“史料”之中。比如,有人会把《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中国通史》等书中描述史实的材料作为史料看待,理由是它们也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或“反映历史进程”的资料。可见,这样的定义是不确切的。

第二类定义则把“史料”解释为“历史遗迹”或“历史痕迹”。例如,梁启超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sup>[7](P44)</sup>何炳松说:“所谓史料,乃前人思想行为之遗迹。”<sup>[8](P8)</sup>白寿彝说:史料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sup>[9](P4)</sup>。这一类定义强调了史料的过去性,但是又出现了逻辑学上的“定义过狭”的问题,它们会让人认为“史料”必须是人类历史的直接遗存,也就是说只有直接材料才算作“史料”(事实上,有些学者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才把“痕迹”和“实物”、“文字资料”并列作为史料的几种类型看待)。因此,这样的“史料”定义,就很容易把那些由后人记述的间接性材料都排除在外,例如,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的历史著作材料能不能算作史料,似乎都成了问题。像这样的定义范围又过于狭窄,显然也不够合理。况且,用“遗迹”来解释“史料”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在史料的分类中还要讲到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而实物史料中又包括遗迹、遗址、遗物等种类,因此,用

减少去翻阅落满灰尘、发黄易碎的故纸堆的时间了。再者,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可以进入世界上几乎所有大档案馆的网站,如中国的中央档案馆等,可以直接使用已经公开的部分档案,而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省级档案馆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其中公开的部分档案亦可直接使用。复次,通过互联网,研究者还可以进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博物馆的网站,如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去搜索所需要的文物或其他实物史料。最后,通过互联网,研究者还可以进入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政府、甚至是联合国的网站,搜索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事件和决策的史料,等等。

网络史料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只要打开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一个流动的图书馆,可以查询所有学科的资料。从历史学来说,只要上网,研究者就可以搜索到这一学科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和动态,包括论著和文章,甚至包括国内外同一学科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或论文全文。互联网之所以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史料载体,还因为其查寻快速,可以大大减少坐“冷板凳”翻阅资料档案的时间。现在几乎所有学习历史的博士生、硕士生都使用互联网查寻史料,众多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在积极地使用互联网,这已经很能说明网络史料的重要性。即便是说史学工作者现在可以“一网打下”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声像、影视等所有史料也不为过。

[陈 述(1955—),男,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网络史料具有其他任何史料载体无法相比的长期使用性,实现了降低成本、无损保存。甲骨文会腐烂;金文可能被腐蚀;陶文可能被打碎;玉石刻辞很难找到其立身之处而看到原件;竹简与木牍同样难以保存和看到原件;帛书也无法长期保存,更难看到其真实面目;纸张(印刷)、图书、文字档案也同样难以长期保存(有纸寿千年之说),要看到真迹亦需劳身费力。因此,作历史的文本研究,网络史料将是现在和今后的最好选择。

网络史料还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可以快速、便捷、准确地查寻所需的文本、图表、文献及重要讲话等史料;二是逐步形成多媒体环境,可以查寻文字、口碑和实物史料;三是翻译器将在互联网络中发挥积极作用,打破了传统查寻史料中的时间、地域、国别和语言等因素的限制。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网络史料也不例外。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史料爆炸,增加了历史工作者辨别真假史料的难度,也增加了处理大量史料的难度,对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但这与网络史料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和好处相比是次要的。鉴于此,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注意新的史料载体——网络史料。这是信息社会赐予史学研究者最为便捷、管用的新工具。我们应充分认识网络史料给史学研究带来的新机遇,积极使用互联网及网络史料,推进史学研究的新繁荣。

##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Data Studies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Special topic for discussion)

QU Lin-dong ZHANG Lian-sheng YOU Bao CHEN Shu

**Abstract** Qu Lin-dong thinks the opinions, methods and experience of the former historians have values and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such as best choice, analysis, differentiation, inscription, general historical data, the twoness of valuing historical data. Zhang Lian-sheng thinks that historical data should reflect the true situation of some historical period. You Bao thinks that inscription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kind of historical data and its hidden meaning must be expounded. Chen Shu thinks that historical data on the Internet are very rich covering practicality, public praise, character, audio and video and so on. The Internet is like a mobile library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speed, convenience and time-saving.

**Key Words** historical data studies; methodology; inscription; historical data on the Internet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把增强]